

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其长存之道

□ 韩建业

中华文明以其伟大、古老和延续至今而著名于世。人们自然会追问，如此伟大的中华文明，到底源于何时何地？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答案。女娲造人，伏羲画卦，神农教民稼穡，黄帝一统天下，大禹划分九州，历代中华先祖的伟大功绩彪炳史册，见诸传说，绵延不绝。中华文明当然就是源自“三皇五帝”，基于中华大地。但近几百年以来，情势大变，先是西方人杜撰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后有中国一些人发起疑古运动，内外夹击，中国传统的古史体系一度摇摇欲坠，甚至出现了“东周以上无史说”这样的极端言论。复原实证中国古史的重任，就这样历史性地主要落在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身上。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

百年以来，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襄汾陶寺、神木石峁、余杭良渚、庆阳南佐，一个关键性遗址被发掘，一页页“无字天书”被揭开，商史成为信史，夏史基本成为信史，“五帝时代”历史也有了诸多线索。考古证据显示的中华文明开端从商代晚期，追溯到夏代晚期，从4000多年，追溯到5000多年、6000年、8000年……不断向前延伸。百年来，我们见证了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如何从被严重质疑到重新肯定，也经历了中华文明自身如何从低潮走向复兴。

大家都熟悉“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提法，但有人说只有3700年，或者长达8000年。分歧为何会如此之大？需要从对“文明”和“中华文明”概念的理解开始。《尚书·舜典》中的“濬哲文明”、《周易·大有·彖》中的“其德刚健而文明”、《易·乾·文言》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等等这些周代文献中的“文明”，指人类在道德修养、社会在礼仪制度层面达到的高度。而现在中文使用的“文明”一词，多指对西文词汇“Civilization”等的意译，一般将其解释为与“野蛮”相对的高级社会阶段或国家阶段，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一套长久传承下来的伟大文化传统，或者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实际上，“文明”“文明社会”“国家”几个概念是需要加以区分的。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将“国家”基本对等于“文明社会”而非“文明”。中华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都是延续3000年以上的原生文明，而非三个狭义的“国家”或者“文明社会”。我们不妨将“中华文明”定义为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

很多人混淆了文明化进程中“起源”和“形成”这样两个阶段。中华文明形成是从中华大地上最早出现早期国家算起，而形成之前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起源过程，而且这个起源过程可以分成两大步。

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人类已有大约200万年的历史，后来连续演化并融合西来人种成分形成中华民族的先祖。距今1万多年，稻作和粟作农业在南、北方分别起源。距今8000年左右，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距今约6000多年，南、北方都

已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有着广大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加上其特有的二元农业体系，能够最大程度保障食物供给的稳定性，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坚实基础。

发展农业最需要精准的农时，这只有观测相当稳定的天象才能做到。比如民间谚语说“二月二，龙抬头”，指的就是东方的龙角星在地平线升起时刻，也是华北地区开始春耕播种的时节。“观象授时”在距今8000多年产生。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一种一端双叉、一端有把手的骨器，类似汉代画像上伏羲女娲拿的天规，还有一类骨尺类器物，这很可能就是“观象授时”使用的“规矩”。“观象授时”自然会引发对天的崇拜信仰，以及向天神神灵的卜问。贾湖发现的萧有石子的龟甲，浙江义乌桥头和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的六画一字的“八卦”类符号，都是比较明确的数卜证据。湖南洪江高庙遗址还发现“天梯”或“通天神庙”遗迹，白陶祭器上也有这类“天梯”图案，加上同出的大口獠牙的飞龙、飞凤、太阳等图案，显示当时确已出现祀天行为和敬天观念。高庙白陶上还有一种八角星纹和圆形的复合图案，被认为寓意“天圆地方”宇宙观，后来传播到中国广大地区。此外，贾湖龟甲上还可能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符号，类似符号还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令人称奇的是，在和高庙相距遥远的西辽河流域，同时出现了大口獠牙的“见首不见尾”的龙形象，暗示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大江南北已出现“一元”信仰或宇宙观。

发展农业还需要很稳定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在8000年前也已经出现了。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百家文化等有着土葬的“族葬”墓地，这在同时期的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罕见。这些墓葬将逝去的人深埋地下，装殓齐整、随葬物品，体现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表明已有了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同一墓地区区分群、成排成列、秩序井然，可能体现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亲疏关系、辈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同一墓地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说明族人对于祖坟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方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贾湖墓葬已有分化，大墓随葬骨制“规矩”、龟甲、骨笛等“圣物”，而且墓主人基本都是成年男性，推测当时已出现祭祀首领和普通人之间的分化，可能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同时期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环境村落，房屋排列整齐，社会也是很有秩序。

距今8000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知识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更进一步来说，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锥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8000年前已经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距今约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的东庄—庙底沟类型在晋、陕、豫交界区迅猛崛起并对外强力影响，导致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最早的文化

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

庙底沟类型的对外影响基于其社会变革所迸发的强大实力。距今约6000年以后，作为核心区的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聚落遗址数量激增三四倍，出现了明显的聚落分化，涌现出数十甚至超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在核心区的河南灵宝西坡等遗址出现了200—500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筑，以及随葬玉钺的大墓，钺当为军权的象征。随后出现了河南巩义双槐树和甘肃秦安大地湾中心聚落，两个聚落遗址面积都在100多万平方米，并且都有殿堂式建筑。

庙底沟时代其他地区也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出现100多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最高级别的墓葬仅随葬玉器就达200件，随葬品中的“洛书玉版”，被认为为蕴含天圆地方、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宇宙观，和高庙八角星纹一脉相承。大约同时期，在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都出现大墓，长江中游的油子岭文化涌现出多座古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则有了牛河梁这样的超大型祭祀中心。

我们看到，庙底沟时代的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出现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有了大墓、城垣、殿堂式建筑，以及大量美玉、美陶等，其建造或者制造需要较为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较高的技术水平，显示已出现掌握公共权力的首领和贵族，社会开始了加速复杂化的进程，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中华文明正式形成

恩格斯提出国家有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凌驾于所有居民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以地区划分国民，就是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也就是“王权”，建立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之上。以上两个标志来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长江下游和黄河中游地区，至少已经达到了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准。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余杭良渚遗址为中心。良渚遗址有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有水坝、长堤等大规模水利设施。内城中部有30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的“台城”，上有大型殿堂式建筑，在级别最高的反山墓地，发现了随葬600多件玉器的豪华大墓。在良渚古城周围分布着300多处祭坛、墓地、居址、作坊等，可以分成三四个明显的级别。诸多超大规模工程的建造、大量玉器等高规格物品的制造、大量粮食的生产储备，都需调动广大空间范围内的大量人力物力，良渚古国无疑存在区域性的“王权”。

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晚期的中心聚落之一，是甘肃庆阳南佐遗址。该遗址发现有多重环壕，外环壕面积600万平方米以上，遗址中部是由两重内环壕和九座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再中间为有围墙的大型建筑区或“宫城”，中央的夯土墙土殿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室内面积630平方米。宫城附近出土了和祭祀相关的精美白陶、黑陶、彩陶，以及大量水稻。多重大型环壕、殿堂式建筑、“九台”的建造工程浩大，白陶等高规格物品的生产存在专业化分工，当时在黄土高原可能存在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拥有区域王权的“陇山古国”。

良渚和南佐都是短时间内集中建设而成的都邑，建设需要调动较大空间范围的人力物力，已经打破了原有各民族社会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凸

显了地缘关系，意味着早期国家的出现。不过这个时期的地缘关系组织或者早期国家，还限制在中国局部地区，因此可称之为“古国”或“邦国”。当然，地缘关系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血缘关系或族群的消失，实际上各族群只是经历了一番“成建制”的整合，血缘和宗族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础。

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社会也都普遍加速发展，初步进入文明社会或者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郑州地区有以双槐树聚落为中心的“河洛古国”，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有城址及规模更大的墓葬，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有20座古城，其中最大的石家河城至少有120万平方米。

4100年前中华文明走向成熟

距今约4500年，在晋南出现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襄汾陶寺都邑，拥有宫城、宫殿建筑、高等级墓地、“天文台”等。距今约4300年，在陕北出现400万平方米的神木石峁石城，其核心的皇城台雄伟高大，外有壮观的石砌护坡，内有宫庙区及精美石雕。黄河以南的王湾三期文化则有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等重要聚落或者古城。这一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有可能形成了一个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大型社会或者早期国家，陶寺古城最有可能是其都邑所在地。黄河下游地区出现偃师、随葬品成套的临朐西朱封大墓，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依然古城林立，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也有了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古城。

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晚期，中原龙山文化大规模南下豫南和江汉两湖地区，很可能对应古史上的“禹伐三苗”事件，随即夏王朝诞生。按照文献记载，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具有“王天下”的“大一统”政治王权，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距今约3800年前进入以偃师二里头为都城的晚期夏王朝阶段，之后的商代和周代是更加成熟发达的文明社会。

中华文明的长存之道

8000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已有“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一元”宇宙观，这是文化上的中国能够融为“一体”，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根源所在。中国地理环境广大多样，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自然具有“多元”结构或多个样貌，中华文明起源也有不同的区域子模式。中华文明诚然是各区域文明社会互相融合、各地文明要素互动汇聚的结果，但黄河中游地区文化和社会发展连续性最强，多数时候都具有中心位置，起到过主导作用，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华文明之花的“花心”。

这样一个“一元”宇宙观和“有中心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中华文明，既不同于西亚、希腊式的“城邦文明”模式，也不同于社会文化高度同质的“埃及文明”模式，而是将具有共同基础的多个支系的社会文化统一起来形成的特殊文明模式，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一元”宇宙观和敬天法祖信仰、“有中心多元一体”格局或“天下文明”模式，以及诚信仁爱、内敛和合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长存于世的根本之道，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上接1版二条）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具有统领性和引领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坚定不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提高全党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注重从政治的高度认清形势、应对挑战、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才能确保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正确前进方向，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政治的根本功能是确保国家运行的正确方向。国家问题是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坚持政治的人民性，强调必须坚持人民立场，人民立场就是党的立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归根到底“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过程中凝聚起伟大的民心力量。

坚持政治权威

正确认识和强调领导核心和政治权威在政党发展和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则。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明确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列宁也指出：“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在伟大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权威，对于确保党的前进方向、巩固党的集中统一、壮大党的领导力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坚持政治权威、维护领导核心，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发挥政治统领作用的关键。在党成立初期，党的事业屡遭挫折，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党内没有一个坚强有力、众望所归的政治权威。1935年的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之所以能扭转中国革命被动曲折的局面，根本原因就是

因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历史经验表明，我们这么大一个政党，这么大大一个国家，要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事业胜利，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权威，必须要坚定维护政治权威的核心领导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发展面临复杂情况的形势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确保党和国家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有力确保我们党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持政党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

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坚持党的性质与宗旨，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政治建设之所以成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依据和内在逻辑。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和使命贯穿党百年奋斗历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各个发展阶段得以充分彰显和不断升华。今天，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实现新时代的目标任务，靠什么？归根到底要靠党的政治建设这一根本建设。实践反复证明，能否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能否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揽，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定不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坚定不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才能确保党焕发新作为、展现新气象，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坚定不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才能坚定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坚持政治引领

着眼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课题，新时代党的建设要坚持思想建党、强化制度治党、严明纪律规矩、提升队伍质量，并将这四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而这四个方面都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

坚持思想建党。思想是政治的灵魂，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以党的思想建设为引领。新时代加强思想建党，解决的要害问题就是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践行群众路线、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这些都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题中应有之义，必须融入党的政治建设全部过程之中。

强化制度治党。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远性的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核心要素。对党来说，优良的制度是党组织得以正常运行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根本支撑；对党员个体来说，优良的制度是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消极性得以有效抑制的不可或缺的强制性力量。这正是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中为什么要更加强化制度治党、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结合起来的内在政治逻辑。

严明纪律规矩。纪律严明、步调一致，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鲜明特征，是党具有强大战斗力和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尤其是政治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把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光荣传统，是立党兴党强党的关键要素。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尤其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重要位置，用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规矩确保党的政治本色，确保党永远坚强有力。

提升队伍质量。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党员队伍质量决定党是否具有先进性和战斗力，乃至决定党的生命。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项建设。我们党已经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的样子”，就是所有党员都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做人民的公仆。能否做到这一点，既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又是判断党的政治建设是否有成效的根本标准。

（作者系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特邀研究员）

（上接1版头条）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出访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称号。残疾人体育屡创佳绩，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在东京第十六届残奥会上实现金牌榜和奖牌榜五连冠，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有力促进了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为世界残疾人体育运动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赞誉：“中国军团‘神勇’……不仅体现了体育精神与实力，更体现了中国式的人权与国家发展的成绩！”

无障碍环境建设显著改善。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2021年底发布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明确，到2025

年，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保障机制更加健全，无障碍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信息无障碍服务深度应用，无障碍人文环境不断优化，城乡无障碍设施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包容性水平明显提升，支持110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加快形成设施齐备、功能完善、信息通畅、体验舒适的无障碍环境，方便残疾

人、老年人生产生活。

中国残疾人事业赢得国际社会普遍赞誉。2022年北京成功举办冬残奥会，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残疾人事业的高度重视、对残疾人人权的高度重视和充分保障，国际残奥委会称赞“中国为未来的冬残奥会树立了标杆”。2017年在北京成功举办2013—2022年亚太残疾人十年中期审查高级别政府

间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赏中国为国际残疾人事务发展所作的贡献。联合国第73届大会主席埃斯皮诺萨、第74届大会主席班迪相继访问中国残联，对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为残疾人组织，中国残联将继续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党的温暖送到残疾人身边，将充分发挥代

表、服务、管理职能，为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提供助力，完善帮扶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提高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巩固和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把帮助困难残疾人过上有质量的生活作为长期任务，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